



# 「法句經」弘傳史

高永霄

「法句」(Dhammapada)又名「曇鉢」，是指佛弟子爲尋求佛陀教法的「法蹟」而言；如「法句經」第一偈云：「車轆於轍」，譯作：車輻經過時，壓於車蹟上。新譯‘Pada’，則爲牛足，解釋爲：車輛隨牛足而行。因此，「法句經」的意義爲：法句是佛陀在世時所說的教法(道理)，經句集而成，故亦名法句集，或法句錄。這些法句爲後來佛徒所依據，所遵循的方法或道路，所以歐洲學者將其意譯爲：「真正的道路」(The way of Righteousness)。

「法句經」有多種譯本，漢譯本(梵文系)現仍留存在大藏經的祇有四種(見新修大正藏)，內容頗有差別。

一、「法句經」(編號二〇一)尊者法救撰 吳天竺沙門

二卷卅九品七百五十二偈 維祇難等譯

譯出時代——西紀二二四年

二、「法句譬喻經」(編號二一一) 晋世沙門法矩

四卷三十九品(屬長行) 與法道譯

譯出年代——西紀二九〇至三〇六年

三、「出曜經」(編號二一二) 姚秦涼州沙門

三十卷卅四品(屬長行) 竺佛念譯

譯出年代——西紀三九九

四、「法集要頌經」(編號二二三)尊者法救集 宋沙門臣

四卷三十三品 天息災譯

巴利文系之「法句經」在南傳巴利聖典中則爲巴利三藏之經藏經典第五「小集經」(Khuddaka Nikaya)十五卷中第二卷，有二十六品(Vaggas)四百一十三偈，句維祇難譯之梵文系「法句經」比較，却缺少了最初之第一至第八品，第三十三品，和最後之第三十六至三十九品，總共缺十三品，即三百二十九偈，與法矩譯之「法句譬喻經」比較，亦缺少十三品，但次第和品名則多相同。

由此可見，梵文系譯本比巴利文系較爲完整。「法句經」在十二分教中屬於無問自說之「優陀那」或「鄔陀南」(Udana)，因爲是集錄佛陀之自說偈而成，其偈散見各經中，與後人所發現之梵文原典和藏文原典之名稱「優陀那品」(Udanavagga)相符，可作明證。

「法句經」在佛陀教法中有崇高的地位，以其行文言簡意賅，容易念誦，道理精要警惕，爲初入佛門者之南針，而在南傳佛教國家中特別受尊重。

「法句經」在印度阿育王時代傳入錫蘭後，受到了佛教人士

普遍的信仰，成爲必讀的經典。到了西紀五世紀時，錫蘭學者覺音 (Buddhaghosa) 將之整理註釋後，更成爲南傳佛典之珍貴法寶「法句注釋」(Dhammapada - trhakatha)，後來，由寶齡美 (E. W. Burlingame) 於西紀一九二二年在美國哈佛 (Harvard) 大學翻譯成英文本出版，其中有譬喻二九九種，成爲哈佛東方全書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一部份。

「法句經」最初出現於歐洲是在西紀一八五五年，由丹麥佛敎碩學霍斯保教授 (Prof. Vincert Fausball) 首次將之譯成拉丁文 (Latin Translation) 出版，並且將巴利文本羅馬字化，引起當時學術界的注意，以霍氏乃哥本哈根大學梵文教授，有相當影響力。當他試圖將一本佛敎經典在有限度的幫助，於傳統的宗教環境下出版，乃是一種果敢的作爲。他同時將巴利經文與拉丁文互相對照，並加以簡畧的註釋。這樣便是第一本巴利聖典出現於歐洲學者的面前，實在是翻譯佛敎典籍的一個里程碑，揭開了歐洲學者研究巴利聖典的序幕。

其後，「法句經」巴利本羅馬字化第二版，相繼於西紀一九〇〇年在倫敦出版，到了西紀一九一四年，倫敦巴利聖典協會 (Pali Text Society) 由蘇曼伽那上座 (Sūriyagoda Sumanjala Thera) 將之重新校訂，印行於世。

西紀一八六〇年，德國學者偉伯 (Albrecht Weber) 將巴利文「法句經」譯成德國文，以“Zeitschrift der Me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名稱在萊比錫 (Leipzig) 出版。

英國倫敦大學中文系教授比爾 (Samuel Beal) 在西紀一八七〇年發現中文本「法句譬喻經」，乃進行翻譯英文，於西紀一八七八年完成，刊行英文譯本。

其後，繼續譯出「法句經」英譯本者，則有穆勒博士 (Dr. F. Max Müller) 於西紀一八八一年出版，該譯本被編入牛津東方聖書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第十卷，穆勒博士係德籍學者，乃巴黎之畢爾諾夫 (Engene Burnouf) 教授的得意門生，穆勒於西紀一八四六年抵達倫敦，即被介紹到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任教。西紀一八四八年，他出版了印度古文學黎俱吠

陀 (Rig Veda) 的英文譯本，奠定了他在牛津的地位。西紀一八五八年，他又出版了「古代梵文文學歷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Sanskrit Literature) 後，聲名大著；由西紀一八七五年開始，他担任刊行牛津逸書 (Ancedota Oxoniensia) 之東方聖書部份。該聖書出版至五十一卷。這是穆勒博士畢生精力所貢獻的鉅著。他對於追求和研究東方古代文獻，尤其是佛敎原典，可說不遺餘力。在他死後 (西紀一九〇〇年)，他所收集的珍貴圖書，全部出讓給東京大學收存。

茲將南傳「法句經」英譯本的譯者及出版年份分列如下：

穆勒博士 (Dr. F. Max Müller)	西紀一八八一年
比爾教授 (Prof. Samuel Beal)	西紀一八七八年
艾曼氏 (A. L. Edmonds) — (詩體)	西紀一九〇二年
胡活特 (F. L. Woodward)	西紀一九二一年
麥士威及申打士 (Magiswara & Saunders)	— (散文式)
蘭門氏 (C. R. Lanman) — (哈佛)	西紀一九二〇年
巴必特 (Irving Barbit)	西紀一九三〇年
皮達西大上座 (Ven. Piyadassi Maha Thera)	西紀一九三六年
愛迪加林博士 (Dr. E. W. Adikaram) — (牛津)	日期未詳
烈達基南博士 (Dr. S. Radhakrishnan)	西紀一九五〇年
佛陀達多大上座 (Ven. Buddhadhata Maha Thera)	日期未詳
尼那達上座 (Narada Thera) — (可倫坡)	西紀一九四〇年
佛陀那祈達上座 (Buddharakkhita Thera)	— (孟加拉)
拜倫 (Thomas Byrom) — (紐約)	西紀一九六六年
阿難陀彌勒 (Ven. B. Ananda Maitreya)	西紀一九七六年
— (可倫坡)	西紀一九七八年

在德國，自從偉伯 (Weber) 譯出「法句經」德文本後，已成爲最流通之佛敎哲理典籍，其後，繼續譯出者有：史高打 (Leopold Von Schroeder) 於西紀一八九二年，紐曼 (K. E. Neuman) 於西紀一八九三年，麥加夫 (Waller Markgraf) 於西紀一九一二年，德奇 (Paul Dahlke) 於西紀一九一九年，及佛蘭期 (F. Otto

Franke)於西紀一九二三年。

「法句經」之法文譯本則由曉耳(Ferrando Hue)於西紀一八七八年，和二位馬勒提(R. & M. de Maratray)於西紀一九三一年譯出。

在印度，「法句經」亦受到印度學者的重視，最初之印地文(Hindi)譯本是在西紀一九〇四年出版，由維爾馬(Suriyakumara Varma)譯出。其後更有六種印度文譯本出現，最遲的一種乃是由波羅奈斯(Benares)的阿難陀古衍那(Ananda Kantsalyana)所譯的。而一位僧伽羅僧(Sinhalese Monk)蘇米難陀(Ven. N. Somananda)將「法句經」譯為塔米爾(Tamil)文。時在西紀一九五〇年。

「法句經」俄文譯本，乃係在西紀一九六〇年出版，成為俄國佛教文庫(Bibliotheca Buddhica)之第三十一種叢書，列為要籍。

日文「法句經」譯本則已有編入「國譯大藏經」經部第十二卷，大正七年(西紀一九一八年)立花俊道教授譯；「世界文庫」，大正十三年(西紀一九二四年)長井真琴教授譯；「岩波文庫」，昭和十年(西紀一九三六年)荻原雲來教授譯；「南傳大藏經」，昭和十二年(西紀一九三八年)辻直四郎譯。

大正四年(西紀一九一五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研究室刊行巴利文及漢文「法句經」對照本。其後，更有日本佛教學者常盤大定著成南北傳佛教原文對照之「英、漢、和譯『法句經』」，是為最完備之法句經文輯錄集全。

由巴利文系翻譯成漢文譯本之「法句經」有下列多種：

「南傳法句經」釋了參譯 西紀一九五三年

「真理的語言」釋淨海譯 西紀一九七二年

「法句經」黃謹良譯 日期未詳

(由泰國南傳大藏經選譯)

「佛說法句經」黃繩會譯 西紀一九七六年

(由穆勒博士英文本譯)

「南傳法句經」以巴利文原本為依據，譯成五字或七字頌句；「真理的語言」參考巴利文與英文本譯成中國的新詩體裁形式；

後二者皆譯成漢體文現代語體文。四者各有千秋，別具風格。

在十九世紀時，有人於亞細亞、庫車、及敦煌地方發掘出了法救(Dharmatrata)撰之「優陀那品」(Udanavagga)梵文原本之片斷，經過當時法國學者李維(Sylvain Lévi)和積加維提(P. N. Chakravarti)研究的結果，發現其與「法集要頌經」相類，但却與「南傳法句經」的偈頌數目相差甚遠，其發表之文章可見：「梵文優陀羅品」(Udānavagga Sanskrit)。

由梵文翻譯成西藏語之「法句經」名為“Ched - du - brjod - padi tshomes” (法集要頌)，被收輯於甘珠爾(Kanjur)和丹珠爾(Tanjur)兩大藏中，全經有三十三品，九百八十五偈，其與巴利文本相合偈祇有二百五十頌，而相合品祇有十數品而已，可見兩系之差異。

藏文本已由佛教學者洛希爾(W. W. Rochhill)翻成英文在倫敦出版(西紀一八七八年)，並分別於西紀一八八三和一八九二年再版，原本之藏文版則由巴克(H. Beckh)校訂後於西紀一九一一年在柏林印行，書名為：「甘珠爾和丹珠爾之優陀那品」(Udanavarga nach Kanjur und Tanjur)。

至於其他方言之「法句經」，有西北印度方面于闐地方發現和掘出之‘Kharoshti’抄本，已由洗納特(E. Senart)於西紀一八九八年在亞洲雜誌(Journal Asiatique)發表研究心得；尚有李維(S. Lévi)於西紀一九三五年在巴黎，適益(E. Sieg)和適益靈氏(W. Siegling)於西紀一九三一年在倫敦分別刊出有關「法句經」與龜茲語關係的文章，後者更著成專書於西紀一九三三年在來比錫出版，以說明「法句經」與烏耆語的關係和研究。

以上大概說明了「法句經」的翻譯流源，及其在佛教史的地位，並且顯示出「法句經」弘傳的範圍廣濶，不失為一本佛教的重要典籍。

「法句經」就是佛滅後在王舍城第一次結集的成果，經過多年的口口相傳，於阿育王時代傳入錫蘭，書以文字，到現在仍保持原有風格，在今讀起來時，好像佛陀所說的教訓仍在耳畔一樣，特別有親切感。(完)